



【梁】刘勰\著 郭晋稀\注译

文心雕龙



岳麓书社

1206.2
LX



[梁]刘勰\著 郭晋稀\注译

文心雕龙

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心雕龙/(南朝梁)刘勰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

2004

ISBN 7—80665—433—X

I. 文... II. 刘... III. 文学理论—中国—南朝时代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6506 号

文心雕龙

作 者:(梁)刘勰

注 译:郭晋稀

责任编辑:徐耕白

封面设计:胡 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6.125

字数:387 千字

印数:1—5000

ISBN7—80665—433—X/I·650

定价:22.50 元

承印: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

地址:望城县城关镇郭亮北路 69 号

邮编:410200 电话:0731—8062261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重印《白话文心雕龙》序

先师郭君重晋稀先生离开我们快六年了。岳麓书社决定重印他老人家注译的《白话文心雕龙》(即今纳入《国学基本丛书》之《文心雕龙》)一书,责任编辑徐耕白君要我写几句话,还说这是郭师母和先生哲嗣郭令原君的意思,我觉得义不容辞。作为郭师的亲炙弟子和先生大著的读者之一,于情于理,怎么会无话可说呢?

四十年前,临近高中毕业,我在书店买得郭先生的《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》。二十二年前,郭师将刚出版不久的新书《文心雕龙注译》赐我。当时我正忝列先生门下求学,曾经就《文心雕龙》、《文镜秘府论》两书的若干问题向先生求教。硕士论文答辩之前不久,我曾奉先生之命校对过《文心雕龙注译》全书,写了一个书面汇报。两年之后的公元1984年,甘肃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,在重印之书的自用本上,郭先生又作了多处修订,这个修订本后来由学生我珍藏。七年前,岳麓书社出版先生的《白话文心雕龙》,我曾奉先生之命校对清样。

《文心雕龙》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宝库中内容最丰富、成就最伟大的著作,其学术地位和影响自有公论,这只要从后世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学习和研究形成“《龙》学”这一专门领域,就可以约略知道。郭君重晋稀先生之前,一批学者如黄叔琳、范文澜、黄侃、刘永济、陆侃如诸先生已经蜚声《龙》学园地。《白话文心雕龙》是郭先生在世出版的最后一部书,离去世仅仅一年。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算起,到1998年去世,郭先生在《龙》学园地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之久。无论是对《文心雕龙》篇次的订正,对该书通行本文句的校勘,对刘彦和世界观、文学观的研究,还是对《龙》学相关理论问

题的探讨,郭先生都付出了大量的劳动,贡献了富有创见的心得。注释精益求精,让读者长见识。译文如行云流水,让人觉得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。《文心雕龙》本来是谈论文章艺术的名著,由于名家注译,更加大放异彩了。

说到郭先生研究、注译《文心雕龙》的贡献,我们举一个例子。该书五十篇的次第,曾经困扰过不少学者。郭先生根据刘彦和自己的《序志》,汲取范文澜等先生的正确意见,更加深入研究全书,强调原作遵用经论因明组织全书的逻辑性,科学地解决了安排五十篇的次序问题。尽管郭先生自己说他“个人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定论”,我们认为他的意见与刘彦和《序志》相合,可以作为定论。尽管刘彦和一直伴有“音实难知,知实难逢”的慨叹,可是《龙》学界毕竟已有学者推许郭先生为刘彦和的知音之一。

古往今来,学术界往往有这种情形:学生多为业师唱颂歌而听众大多不相信。这当然不能说没有理由。所以我们这里说的只是师门之外学者们的公论(或者多数人的评论)。下面要说的两件事,还是从师门之外知道的。一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,《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》问世后,不久就流行港、台、日本以及意大利诸地,引起学界同道注意。二是周振甫先生写的《悼念郭先生》一文(收入2000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郭晋稀纪念文集》),因为他注译《文心雕龙》的书比郭先生的《文心雕龙注译》早一年出版,未能参考郭先生注而“不无遗憾”。这两件事,前后相隔三十余年,都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郭先生研究《龙》学的成就。顺便说到另一件事: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头三年,我曾有幸师从“当今治《礼经》之第一人”沈凤笙文倬先生,学治中国古代礼书礼制。1987年,听沈先生说《礼经》十七篇的次第也有错乱,凤笙师加以研究整理,现在是井然不紊了。当时凤笙师就说到郭晋稀先生对《文心雕龙》编次的整理,深表理解和赞同。

敬爱的君重先生是国学大师杨遇夫树达、曾星笠运乾、钱子泉

基博、骆绍宾、鸿凯、马承堃、宗霍诸先生的入室弟子。以他的功力，潜心《龙》学半个世纪，最后成就《白话文心雕龙》一书，其沾溉《龙》学士林与相关学科学子，可想而知。所以我们认为：《白话文心雕龙》一书再版重印，其纪念意义与学术意义都是很明白的，无须多说。

受业陈戍国写于公元 2004 年 5 月 19 日，
湖南大学友谊村之三楼

例 言

一、本书原文，以黄叔琳本为底本。凡校改校增之字，于字外作〔 〕为标志，然后在（ ）内说明原作某增某，简略说明依据。依据只指出最早版本或最先校定者姓名。如有补充说明，则另在注释中申述。

二、“自序”或“注”中引用原文，以校改后为准，不再全用黄本。

三、注释征引经传典籍或他人注释，加以删节，力求简略，不加详说。其征引原文，一般不再加注释，少数疑难字句，则偶加说明。

四、注音详前略后，凡前文已注音者，后文不再重出。注音只注《文心雕龙》原文，不注引用经传。注音或不完备，读者谅宥。

五、本书各篇自有层次段落可分，然各家注释本并不完全一致。因为认识有不同，标准亦复各异。本书分段，既依据原文层次段落，也照顾到这是个译注本，为了读者在看译文时，对照原文与注释的方便，把原文太长的段落，适当的分短，这样的情况，也是存在的。

六、译文力求忠实原文和句式。但是极个别的为地方，为了行文之明畅，增入了短句和词组，在增加之处加括号（ ）。原文的“赞曰”以下部分，本来是叶韵的，过去译本包括我的译本，都改为散文。现在这个译本都改用了韵文。以韵文译韵文是困难的，适当的在句中增入了词组，请读者谅宥。

七、本书是在我的“注译”本的基础之上，参阅了现今流行的许多注本或译注本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写成的。当然，认识总是有局限的，加之属稿仓卒，旧有的错误，未必能全部改正，新增加的错误，更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直言指出，匡其不逮，无限感谢。

自序

刘勰的生平、时代和著述

刘勰字彦和，祖籍东莞莒人，即今山东莒县。因为永嘉之乱，山东莒县沦陷，晋明帝时又立南东莞，镇京口。刘勰的祖先，在永嘉之乱的时候，也就南迁，侨居京口，所以又称京口人。《梁书·刘勰传》里说：“祖灵真，宋司空秀之弟也。父尚，越骑校尉。”刘灵真、刘尚虽然已不可考，可是刘秀之在《宋书》里有传。传中说：“刘穆之从兄子也。”刘穆之在《宋书》里也有传，是汉齐悼惠王肥的后代。刘穆之一支在京口可能有一定地位。时代的推移，各支的消长，刘灵真一支渐次就式微下来。《刘勰传》里说：“勰早孤。”又说“家贫不婚娶”，则刘勰在当时的落寞可以概见。在《文心雕龙》里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刘勰对所处社会地位低下的感慨。《史传》篇说：

至于纪编同时，时同多诡，虽定、哀微词，而世情利害。勋荣之家，虽庸夫而尽饰；逋败之士，虽令德而常埋；吹煦霜露，寒暑笔端，此又同时之枉，可为叹息者也。

《程器》篇也说：

盖人禀五材，修短殊用，自非上哲，难以求备。然将相以位隆特达，文士以职卑多谪，此江河所以腾涌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。

《文心雕龙》本来是“论文叙笔”，“剖情析采”的，但是遇到历史上论述不公平，常常发出感慨，情注墨中，这些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与其身世分不开的。

刘勰的生平，已经不可确考，但推断基本上是接近的。大抵生于宋明帝泰始三年，即公元467年左右。齐东昏侯永元元年，即公

元 499 年前后,开始写《文心雕龙》,这时已经三十多岁了,所以《序志》篇云:“齿在愈立。”于是搦笔和墨,乃始论文。至迟在和帝中兴二年,公元 502 年成书(此用刘毓崧说)。

刘勰的卒年,从来疑不能定。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以为:

彦和自宋泰始初生,至普通元、二年卒,计得五十六、七岁。

陆侃如和牟世金的《文心雕龙译注》、周振甫的《文心雕龙注释》,在他们著作的前言里,和范氏之说,是一致的。八十年代左右李庆甲写了一篇《刘勰卒年考》,依据《续藏经》中《隆兴佛教编年通论》等书的记载,“昭明太子薨”,“刘勰表求出家”,“未期而卒”。昭明太子卒于中大通三年,即公元 531 年,刘勰死于昭明之后的期年,即公元 532 年左右。虽然南宋的这些和尚做“佛教编年”系年有错乱,但他们依据刘勰和萧统的关系,一致认为刘勰在萧统死后表求出家,然后未期而卒,是合情合理的(详见《文心雕龙注译》)。杨明照做《梁书刘勰传笺注》又依据《续藏经》的材料再加以推论,以为刘勰死于大同四年(公元 538 年)或五年(539 年)(详见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)。

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以后,刘勰谒见了沈约,深为沈约所器重,因此天监元年(即中兴二年),起家奉朝请。公元 504 年即天监三年做了中军临川王记室。从公元 505 年即天监四年,到公元 511 年即天监十年止,做车骑仓曹参军,并且出任太末县令。从公元 511 年起到公元 518 年即天监十七年止,做南康王记室。公元 519 年即天监十八年,兼东宫通事舍人,并且兼步兵校尉。在舍人任内得与昭明太子萧统接近,极为太子所敬重。公元 531 年即中大通三年,萧统去世,刘勰便离开宦海,回定林寺与沙门慧震撰经,没有一年,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
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问题,即刘勰的生平与佛家的关系问题。《梁书》本传说勰“早孤,家贫不婚娶”,然后才是“依沙门僧祐,与之

居处积十余年”，大致是“天监初，起家奉朝请”，才离开僧祐的。如果说刘勰是二十岁左右（公元487年左右）往依僧祐，离开时已经三十四岁左右了。在这十四年左右，他自然研究了佛家经论，受到了佛家思想影响，所以本传里说：“遂博通经论，因区别部类，录而序之，今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。”但是他之所以依僧祐，并不是出家作沙门弟子，可能是由于“家贫，不婚娶”，而定林寺藏经既多，其他藏书也很富足，起居饮食可能也方便的缘故。他于是在这里读书，既读四部之书，也读四部之外的经论。他也在这里著述，他既为经论区别部类，录而序之；他也论文叙笔，剖情析采，写出了历史上的伟著《文心雕龙》。他博通经论，所以用佛理来部类藏经，序录藏经。在行文布彩上可以借鉴四部，在部类和序录藏经固无需借用孔孟也。他也广读四部，所以用宗经征圣来品评历代，在行文剖析上可以借鉴经论增强精密，在发挥文理弥纶经义时也无庸借用佛法啊。所以《文心雕龙》一书并不存在怎样处理儒与佛的关系问题，更不存在以佛统儒，佛儒合一的问题。《文心雕龙》完成于南齐末年，梁武佞佛，还远在其后。刘勰起家奉朝请，是在梁武天监初年，他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了近三十年，一直到中大通三年，萧统去世，才“启求出家”，才“燔鬓发以自誓”，才“改名慧地”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：一、宦海的浮沉，使他看清了“南柯”的梦幻；二、萧统的死去，使他既失去了仕途的依靠，也参透了人生的空虚。他在写《文心雕龙》的时候，不过是在和尚庙里读书的书生；直到中大通三年，一步步醒来，一步步参透，于是脱去了官服，穿上了袈裟，做了和尚，所谓“干寺变服，改名慧地”。于此，我们更可以知道：他写成《文心雕龙》后，为甚么要负书去干见沈约，绝不是为了宣传佛旨，而是为了使寺院的书生，成为官场的食客。

我们既论述了刘勰的生平，便想进一步谈谈他的时代。但这个时代并不局限于他写《文心雕龙》的时代，而想谈谈一个更大的时代潮流，即整个魏晋到刘宋南齐的时代。这段时间有几个特点：

一是晋代以来,《周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之学,最为盛行,也是佛经翻译东来的时代,故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专载佛经一类。西晋玄风,主要的还是《老》、《庄》;东晋清谈才渐入佛理。支遁、法深、道安、惠远,都是当时有名的缁流。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云:“江左篇制,溺乎玄风。”《时序》云:“自中朝贵玄,江左称盛,因谈馀气,流成文体,是以世极迍邅,而辞意夷泰,诗必柱下之旨归,赋乃漆园之义疏。”虽然刘宋、南齐,文风大有变革,但思想界受佛家影响更大了。刘勰所与居处的僧祐,便是佛经的收藏家,又是《弘明集》的编辑者。《弘明集》中所收的文章,宋代作家有宗炳、何承天、颜延之、罗含、孙盛、郑道子、谢镇之、朱昭之、朱广之、释慧通、释僧愍、何尚之、李森、释道高、释法明、范泰、释慧义等人;南齐作家有明僧绍、张融、周顒、萧子良、孔稚圭、释僧严、刘君白、释道盛等人;梁代作家有刘勰本人和释僧顺、释玄光、武帝、萧琛、曹思文、范缜、释法云等人;以及后秦诸人之作。这样的一种学术思想风气,对文学的直接影响,当然就是使玄言文学,成了刘勰批评的对象。当然也应该承认,它同时开拓了人们的眼界,田园山水文学的出现,使人在繁华纷扰的世界之外,看到了千峰竞秀、万壑争流的美景,而在自然美景中所渗透的“此中有真意”,也是具有玄言与佛学的哲理感受。

二是文学的地位,在宋、齐时代提高了。在魏、晋时代,虽然文学大盛,但文学未尝别立一科。到宋文帝时,才在儒学、玄学、史学之外,另立文学馆。明帝立总明观,分别儒、道、文、史、阴阳五部,文学独立为一部。史籍中有《文苑传》,虽然始于《后汉书》,却也是刘宋范曄所著。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中,虽晋荀勖有《杂撰文章家集叙》十卷、挚虞有《文章志》四卷,但后来更多了。宋傅亮有《续文章志》二卷,宋明帝有《晋江左文章志》三卷,齐、梁沈约有《宋世文章志》。齐王俭撰《七志》中有《文翰志》,梁阮孝绪撰《七录》,以为“顷世文词,总谓之集,变翰为集,于名尤显,故序《文集录》为内篇第四”。由于文学地位的提高,因而大家注意文学的特点,文学

的形式,这对于文学的发展,文学理论的研究,无疑地起了推动作用。《文心雕龙》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出世的。他在《序志》里说得很清楚:“敷赞圣旨,莫若注经,而马、郑诸儒,弘之已精,就有深解,未足立家。”这是从反面说的,然后转到正面来:“唯文章之用,实经典枝条,五礼资之以成,六典因之致用,君臣所以炳焕,军国所以昭明,详其本源,莫非经典。”这样强调文学的价值,当然是有局限的,但是,总算想到文学的重要性了。《序志》里也谈了他之所以作《文心雕龙》,是在大量文论出现的情况之下,来总结成书的,他认为:“魏《典》密而不周,陈《书》辩而无当,应《论》华而疏略,陆《赋》巧而碎乱,《流别》精而少功,《翰林》博而寡要。又君山、公幹之徒,吉甫、士龙之辈,泛论文意,往往间出,并未能振叶以寻根,观澜而索源,不述先哲之诰,无益后生之虑。”确实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在许多文论的基础之上,“振叶寻根”、“观澜索源”的著作了。

三是宋、齐以来,文笔区分,更为明显。虽然文笔并提,汉代已经出现,如王充《论衡·超奇》:“文笔不足类也。”但文笔之名盛行,却是刘宋以来的事。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:“帝尝问以诸子才能。延之曰:‘峻得臣笔,测得臣文,龔得臣义。’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云:“今之常言,有文有笔。以为无韵者笔也,有韵者文也。”因为文笔区分,是齐、梁时代的常言,所以昭明《文选》中的选文,便以诗赋为主。他不选经书,虽然说是:“孝敬之准式,人伦之师友,岂可重以芟夷,加之剪截。”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。至于不选诸子,就说:“盖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。”不选说客之辞,就说:“虽传之简牍,而事异篇章。”不选史传,就说:“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。”这并不是萧统个人的创造,而是宋、齐以来,文学的概念,社会上已经很清楚,文笔之分,也成为当时的通论了。

四,由于文笔的区分,文学的专门化,如果只从形式上强调文学的特点,而忽视创作的内容,必然产生形式主义、唯美主义的倾向。宋齐文学的这种倾向是很明显的。裴子野《雕虫论》云:

自是(指宋)閨閻少年,貴游總角,罔不揜落六藝,吟咏性情。學者以博依為急務,謂章句為專魯。淫文破典,斐爾為功,無被于管弦,非止乎禮義。深心主卉木,遠致極風雲,其興浮,其志弱。巧而不要,隱而不深,討其宗途,亦有宋之遺風也。

蕭子顯《南齊書·文學傳·論贊》云:

今之文章,作者雖眾,總而為論,略有三體:一則啟心閑繹,托情華曠,雖存巧綺,終至迂回,宜登公宴,本非准的,而疏慢闡緩,膏肓之病,典正可采,苦不入情。此體之源,出靈運而成也。次則緝事比類,非對不發,博物可嘉,職成拘制。或全借古語,用申今情,崎嶇牽引,直為偶說,唯睹事例,頓失清采。此則傅咸《五經》,應璩《指事》,雖不全似,可以類從。次則發唱驚挺,操調險急,雕藻淫艷,傾炫心魄,亦猶五色之有紅紫,八音之有鄭衛,斯鮑照之遺烈也。

劉勰對當時的創作傾向,也是很不滿的,文章所至,筆墨鞭撻,時見于篇。如《序志》云:

去聖久遠,文體解散,辭人愛奇,言貴浮詭,飾羽尚畫,文綉鞏悅,離本彌甚,將遂訛濫。

《定勢》批評當時文辭訛濫,是相當深刻的:

自近代辭人,率好詭巧,原其為體,訛勢所變,厭黷旧式,故穿凿取新,察其訛意,似難而實無他術也,反正而已。故文反正為乏,辭反正為奇。效奇之法,必顛倒文句,上字而抑下,中辭而出外,回互不常,則新色耳。……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,苟異者以失體成怪。旧練之才,則執正以馭奇;新學之銳,則逐奇而失正;勢流不反,則文體遂弊。

劉勰的時代,是與劉勰創作《文心雕龍》密切聯系的。《文心雕龍》以外,劉勰的其它著作則是與佛經翻譯乳水相關的。據《梁書》本傳說:“文集行于世。”可是這部文集,連《隋志》都未著錄,可見那

是早已亡失了。

《梁书》本传里还提到：“然勰为文，长于佛理，京师寺塔，及名僧碑志，必请勰制文。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，《弘明集》中收有他的《灭惑论》一篇，孔延之《会稽掇英总集》中收有他的《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》一篇。其余的就不可得而知了。

但是，刘勰依僧祐十四年左右，在定林寺食宿衣物所需，或者也有赖于僧祐。他除了帮助僧祐部类藏经、录而序之以外，《高僧传》所记僧祐的著作，现在还有流传的，其中未必没有刘勰代笔。因为刘勰这时是一个俗家子弟，僧祐同意，其它佛门弟子无杂言，可能就是这些缘故。前人和杨明照君在《梁书》本传笺注的推测，是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的。

还有，据《梁书》和《南史》本传，应该有《定林寺经藏序录》一篇，据梁释慧皎《高僧传》，其中的《释僧柔传》、《释僧祐传》、《释超辩传》都说到刘勰曾替他们作墓碑，由于高山为谷，深谷为林，这些墓碑都看不到了。将来是否有的还会出土，则很难说了。

刘勰其它文集及作品的湮灭，是可惜的。但《文心雕龙》一书，与世长存，却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卷数、篇次和体例

关于《文心雕龙》的卷数和篇次问题，我专为此写过论文，我的《文心雕龙注译》也有详细论述，可以参阅。在这里只把有关结论性的意见，加以简略的说明，就不再详细论证了。

现在《文心雕龙》流行的本子，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即分为十卷，每卷五篇，每篇标名次第，“原道第一……序志第五十”。这个分别卷次是很早的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明白载着《文心雕龙》十卷。《隋书》是唐初修定的，《梁书》和《南史》也是唐初修定的，然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刘勰本传里都只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不分十卷。可见《文

心雕龙》是否分为十卷，唐初人的看法就已经有分歧了。

据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刘勰自己说：“上篇以上纲领明矣”，“下篇以下，毛目显矣”。则《文心雕龙》只分上下两篇，或者上下两卷，是刘勰自己说的，现在把它分为十卷，则是唐初到现在的人加上去的了。

为什么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人（不是全部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纠正了十卷的看法）都把它分成十卷呢？因为《序志》里说：

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。”

是以开卷五篇，笼罩全书，为体系。又说：

崇替于《时序》，褒贬于《才略》，怛悵于《知音》，耿介于《程器》，长怀《序志》，以驭群篇。

是以五篇殿末，结束全书，为体系。因此读者以为作者是以五篇为一卷，全书五十篇，所以分为十卷。而且在篇名之末，加上次第。这样分卷的人，只读了《序志》，没有细读全书，不知道中间四十篇并不能五篇分卷，因此全书分作十卷，是没有根据的。

而且《序志》以《时序》《才略》《知音》《程器》《序志》作为最后五篇，现在通行的各本，却以《物色》插在《时序》和《才略》之间，很明显的是错了，首先由范文澜指出来了。我们细读《序志》发现从《神思》到《物色》，篇次还有错误。原来的《文心雕龙》本来没有1—50的篇次，后来加上每篇的篇次，倒把人搞得更加糊涂。我校改了篇次，在六十年代的《文心雕龙十八篇译注》里就简略提到了。在八十年代初，又发了文章。1982年所写的《文心雕龙译注》，前言既申述了我的意见，而且将全书的篇次也重新调换了的。台湾有的《文心雕龙》学者，也部分采纳了我的观点，当然国内有的同志，并不同意范文澜等和我的意见。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，现在出版这本书，在前言和《序志》注释里简略申述自己的意见，全书的篇次则一

仍其校改之序。

前人著书，往往把自序摆在篇末，用来概括全书，申述著书要旨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、《汉书·叙传》、《淮南·要略》都是如此安排的。而且在自叙里指出了篇次，每篇著述的旨意。刘勰博通经论，虽然没有在其文中敷述佛法，他却遵用了经论中的因明，逻辑性极强地组织了全书，安排了篇次。《序志》中说：

盖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固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时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，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

我们按照刘勰的这个说法，来阅读《文心》的前二十五篇，如振衣挈领，就有条不紊。现将上篇排目如下，加以说明：

《原道》 本乎道。

《征圣》 师乎圣。

《宗经》 体乎经。

《正纬》 酌乎纬。

《辨骚》 变乎骚。 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

《明诗》

《乐府》

《诠赋》

《颂赞》

《祝盟》

《铭箴》

《诔碑》

《哀吊》 以上八篇论文

《杂文》

《谐隐》 以上两篇间乎文笔

《史传》

《诸子》

《论说》

《诏策》

《檄移》

《封禅》

《章表》

《奏启》

《议对》

《书记》 以上十篇叙笔

以上二十篇论文叙笔，固别区分。

至于如何论文叙笔，作者有一定的体例，就是：“原始以表时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。”先以论文中的《诠赋》为例，加以说明：

自“邵公称公卿献诗”起，至“斯又小制之区畛，奇巧之机要也”止，叙述赋的源革，就是刘勰说的“原始以表时”。“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”，讨论“赋”这一体裁定名的涵义，就是刘勰说的“释名以章义”。自“观夫荀结隐语”起，至“亦魏、晋之赋首也”止，就是指出赋的范文，便是所谓“选文以定篇”。自“原夫登高之旨”以下到篇末，总论作赋的要求，便是所谓有“敷理以举统”。此处秦汉十家各选篇目，魏、晋各家未选篇目，只是泛论成就，行文变换也。

再以叙笔中之《论说》，摘其叙“说”为例，加以说明：

自“过悦必伪”起，至“莫能逆波而溯洄矣”止，便是“原始以表时”。“说者，悦也。兑为口舌，故言咨悦悻”。便是“释名以章义”。自“说贵抚会”起，至“所以历聘而罕遇也”止，便是“选文以定篇”。自“凡说之枢要”起，至篇末，便是“敷理以举统”。

论文叙笔凡二十篇，虽然不能截然把每篇划为四段，这是行文不能不有变化，而且论述内容又各有长短的缘故。但从总的来说，